

文房四宝纵横谈

谢德萍 孙敦秀 著



文津出版社

谢德萍

孙敦秀 著

孙敦秀著
谢德萍绘
孙敦秀书

文津出版社

文房四宝纵横谈

Wenfang Sibao Zonghengtan

谢德萍 孙敦秀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展望(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87,000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30

ISBN 7-80554-024-1/Z·3

定 价: 3.60 元

文房四宝之精良

湖筆瀟墨宣紙端硯

蘇鑒書



序　　言

“文房四宝”即书房中常用的四种器具——笔、墨、纸、砚的统称。这种美誉，由来已久。古时，我们的先人在创造灿烂的书画艺术的同时，也创造了这四种精良的文化用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画艺术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成为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瑰丽的奇葩，“文房四宝”同样伴随着书画艺术的进展而不断丰富自身，日趋完备。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我国文明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两个瑰宝。

“文房四宝”，并不是始有文字就已具备齐全，发展也不是并驾齐驱，其问世各有先后，各有其自身的形成、演进、完善的过程。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加以研制、改进，使之成为品种多、用途广、技术精湛的一整套书写工具。它以独特的民族特色、时代风格和工艺规范，为历代临池者所艳称，名闻遐迩。

“文房四宝”，从广义上讲，泛指一切笔、墨、纸、砚；从狭义上说，因时而定，因物而论，因地而名。在纸未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前，多以竹、木简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年代，“文房四宝”就已初具形制，为世人所重。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实物来看，笔、墨、代纸材料的筒及砚，已较完备、齐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四种文具实物。

西汉时，纸虽初露头角，仍未广泛应用，书写材料多沿

袭秦时的竹、木简。四种文房器具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到了东汉，宫廷中专门设守官令一人，主管御用笔、墨、纸张；当时的书家已较讲究文具的选用，汉隶代表书家蔡邕作书时最喜用张芝笔、韦诞墨、左伯纸。古籍中也多把三者并列记述，这里虽没有提及砚，可以想象，现在东汉时也必定成为不可缺少的文具之一，特别是纸的运用和竹、木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纸的发明为“文房四宝”的完备增添了重要内容。

晋时，纸取代了竹、木简而成为主要书写材料，“文房四宝”的内容才名符其实。较为完备的笔、墨、纸、砚，有力地促进了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和成熟。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叙述较为详尽的理论研究著作，从此便把笔、墨、纸、砚相提并论，并多见于当时书家著录的字里行间，传为晋女书法家卫夫人所作的《笔阵图》、晋书圣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均有对这四种器具各自特点作用的形象比喻和择优选佳的论述。更令人惊奇的是，1974年，南昌市区东湖一东晋墓中竟发现一件木方上记载笔、墨、纸、砚的文字，这使我们看到了我国最早的“文房四宝”皆备的墓葬文字记录，为研究“文房四宝”的发展、演变和应用，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我们可以这样说，晋时这四种器具的定型过程已基本完成。

唐时的笔、墨、纸、砚，已有名优产品著称一时，饮誉海外。名品宣笔，较为完美；松烟墨制作已有较高的水平；宣纸已名噪一时；四大名砚（山东鲁砚、广东端砚、安徽歙砚、甘肃洮砚）驰誉四方。这些精致绝伦的文房器具，已受到当时书画家、文人墨客的广泛赞扬。武则天时的李峤就有咏

《纸》、《墨》、《砚》、《笔》的诗传世，使文房四宝登上诗坛，而广为流传。

南唐时，这四种器具在品种、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经过人们的实践和文人的倡导，“文房四宝”始有特定的内容，人们把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诸葛氏笔、婺源龙尾砚，并称为南唐时的“文房四宝”。宋时的新安（今安徽徽州地区），则把产于该地区的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羊斗岭旧坑砚，合称为“新安四宝”。

北宋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地介绍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一名为《文房四宝谱》，苏易简撰写。“文房四宝”一词最早应出于此处。当时的书画家、文人都相当讲求精笔贵纸，妙墨佳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试笔》中说：“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足以证明“文房四宝”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宋时，地方官为取悦皇上，盛行以“文房四宝”上贡之风，徽州知州谢暨与理宗有椒房之亲，曾以新安四宝作为入贡的佳品。到了元代，文房器具的制作多沿袭旧法，改进不大，唯有“湖笔”声名大著。明时，这四种器具的制作技艺相当考究，逐渐朝着偏贵重、追求形式美的方向发展，使之具有高度的观赏和艺术价值。而在一些书家的著录中，则对这四种文具进行了座次排列，纸笔尤乃居先。明时“文房四宝”一词已流传开来，明李实曾有“四宝居一员”的咏砚诗句传世，以此管窥一斑。

明末清初，笔、墨、纸、砚的制作已达到较为完美的境地。浙江湖州府治的湖笔，安徽宣城府治的宣纸，安徽徽州府治的徽墨和广东肇庆府治的端砚，被誉为全国的“文房四宝”，至

今盛名不衰。清时《纸墨笔砚谱》一书是较为集中叙述文房器具的专著。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掠夺和三座大山的压迫，笔、墨、纸、砚的生产气息奄奄，一片凋零。许多名产品工艺几乎失传，有的被破坏殆尽。新中国成立后，其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许多传统产品得以重新恢复，并涌现了许多具有新时代气息、新的艺术风格的产品，不仅供国内创造书画艺术之用，而且还成为加强同国外友好睦邻关系的一条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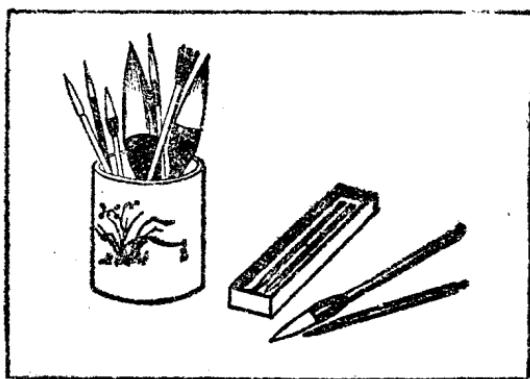
今人对“文房四宝”的研究的著录，有穆孝天编著的《安徽文房四宝史》，区域性较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论述安徽所产笔、墨、纸、砚的历史演变的专著。1978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代文具展览”，该馆工艺美术研究组根据这次展览的展品，按笔、墨、纸、砚四门列次，上自原始社会，下迄现代，以一百六十余幅的图版和少量的文字，编写了《笔墨纸砚图录》一书，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过去“文房四宝”的知识多散见于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的书画著录中，一鳞半爪，很难系统地论述它的发展全貌。今天，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广泛开展，我们对“文房四宝”这一宝贵的民族遗产，也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收集，利用两年时间编著了这本小册子。为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记忆，我们按时叙事，以事带时，分门别类，对“文房四宝”的形成条件、主要产地、时代特征、制作材料、技艺方法和演变过程逐一讲述。阅后使读者对我国“文房四宝”的历史渊源、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向以及和其它诸多艺术的彼此关系有一系统完整的了解，这便是我们编著此书的主要目的。

1989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笔.....	1
墨.....	81
纸.....	133
砚.....	219
后记.....	272



- 一、硬笔的开端
- 二、我国硬笔的发展
- 三、西洋硬笔的传入
- 四、毛笔的构造
- 五、毛笔的考证
- 六、毛笔最早的记录、实物及传说
- 七、两汉制笔业的兴起
- 八、魏晋南北朝制笔业的繁荣
- 九、唐代制笔工艺及名笔
- 十、宋代制笔的改革
- 十一、元代湖笔的崛起
- 十二、明代制笔技艺的外传
- 十三、清代制笔的特点
- 十四、解放前后制笔生产的对比

笔居“文房四宝”之首，多称为书具之主。没有笔就没有文字的记载，就没有书法艺术的发展，所以笔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文房四宝”中的笔，多是指兽毛加工而成的毛笔而言。现在笔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庞大的家族，其范畴包括软笔、硬笔两大类别。软笔指毛笔，我国的毛笔历史悠久，制作精良，种类繁多，早已驰名海内外，在我国书法史上一直占有统治地位；硬笔包括钢笔、圆珠笔、铅笔、粉笔以及其它竹、木、骨、金属和塑料等其它硬质材料制成的笔。其渊源流长，品类极富，在书法史上同样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硬笔的开端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和绵绵不断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经过人们长期的共同实践，创制了各种各样的书写工具。硬笔首先揭开了人类文明的第一页。早在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用有色的石块在山洞里画图画，用尖骨器在骨版上刻划符号，

这些石块和尖骨器便是最原始的硬笔。在北京西南周口店一地的“北京人”遗址，发现骨骼上有许多刻划痕迹。考古学家根据在此地同时发现的锥形尖骨器，认定这就是刻痕的工具，是我国笔的远祖。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书中认为：“这种尖骨器和骨骼上的刻划，同时同地的发现，给与美术起源一极要的回答——尖骨器就是在骨版上刻划线纹的工具。”唐代道世《法苑珠林》中说：“析骨为笔。”这种骨笔，实无法可查，有可能是与发掘的尖骨器相似。

1952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了一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氏族村遗址，在这里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划着许多花纹图案和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古文字学家对这些符号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少数遗存。这又一次证明了在原始社会我国的笔就已存在，而且就有硬笔刻划文字、图画的历史。

原始社会发展到后期，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已经有了专门的制陶、制骨、制玉器的手工业，笔的制作开始出现了多样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地区大汶口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氏族遗址，在此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符号，呈现出明显地刻划和书写的两种不同的风格，而刻多于写。刻是硬笔所致，写则是柔软的工具所成。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硬笔仍占主导地位，软质书写工具已崭露头角。这些书写符号已开我国书写文字的先河。

原始社会末期，仍不乏有用石器在山崖陡壁上刻划图画和文字的符号。1982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南麓北侧的将军崖下的一座长22.1米、宽15米的平整而光亮的黑色花岗岩上，发现了三组原始社会末期的岩画及古文字，因当时尚无

人了解它的内容，考古学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部天书”。岩画内容有农作物、人面像、动物头骨、日月星象……。大多以复线三角纹、弦纹和网纹组成；上有十八种古文字，刻画简略，粗糙古拙。观其上面刻痕的断面多呈“V”形状，经专家研究，和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工具——石斧的断面正相吻合。这充分证明了，这些岩画符号，是先经敲凿，后用石斧磨刻加工而成。这种石质的刻画工具，便是当时的硬笔。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考察我国原始社会具有代表性的陶器艺术，上面的刻划符号或岩石上的原始刻划，虽然还没有形成文字，但已是孕育我国文字的胚胎。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是汉字发展的历史。”又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所以古文字刻划的历史也就是原始硬笔的历史，是原始硬笔占主宰地位的历史。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笔的制作、技艺等都有所改进和发展，在原始硬笔的基础上，已始用竹、木质为原料的书写工具。《物原》中说：“伏羲初以木刻字，轩辕易之以书刀。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这说明伏羲氏初以尖木棍画八卦，轩辕氏则以石刀片刻划文字；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虞舜帝已改进书写工具，创竹枝笔，蘸漆在方简上书写文字。从此开创了我国用笔蘸墨书写文字的先例。

几乎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创造自己文字的初期，都借助于硬质材料制作成书写工具。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早期王国时期，就始以削尖的植物

茎秆作笔，创制记录原始文字。据说，初用灯芯草制作，后改为芦杆、低草秆、莎草秆、竹枝等原料制成。然后蘸墨汁（墨汁制作为菜汁加烟渣调和而成或煤黑和水混合而成等）在纸草上进行书写。由于这种笔制作较易，又便利书写，所以在下埃及出现后，和纸草一起很快风靡全埃及。后来，又先后为古希腊、罗马、叙利亚、波斯等地区广泛采用。

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亚洲伊拉克）的苏美尔人写字，则用削尖的芦管、木棍和骨棒作笔，以当地的软泥板为书写材料。写字时用制作的书写工具在软泥板上刻划或按压，这样就呈现一个凹进的笔划符号，状如钉子或楔子，因而故名为“钉头文字”、“箭头字”或“楔形字”。这种文字为后来巴比伦亚述、赫梯、马拉尔图、叙利亚、古伊朗广泛使用，均作为表达自己语言的工具。现美国一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经考古学家译解后，断定为公元前1700年美索不达米亚厨师刻写的食谱。泥板上分别刻写着一百多种汤的做法和八十多种乳酪以及其它粮食制品的做法，足见当时硬笔使用的普遍性。

再如创造印第安文字的塞奎亚，在艰巨的创造文字初期，就是用木制的棍儿在沙地里涂划，或用刀子在树皮上刻记符号，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终于创造了一套完整、易学的柴拉基文字。美国西海岸山区有一种高大挺拔的红杉树，人们称它为“塞奎亚”，以示纪念。

由于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人类曾多以粗拙的质材制作书写工具，撰记着自己的历史。原始的硬笔，已成为人类创造文明、记录文字、传播知识而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它又是后来各种笔产生的雏形和前身。

二、我国硬笔的发展

原始社会的笔多是由简陋、粗糙、质地较为坚硬的石、骨、木制成，其书写速度及线条表现力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到了奴隶社会，由于打破极端狭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但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书写工具材料也有了进步及演变。锐利的铁制“刀笔”和以单一的植物材料制作的笔，已广泛使用。就“刀笔”而言，自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到今日，历代的文字都留下了它的痕迹，充分发挥了原始硬笔所起不了的威力。从书写速度到字划的流畅优美，都有一个大的飞跃。发展到殷商时代，文字多刻在龟甲兽骨、金属器皿等硬质地的材料上，非硬笔所不能达到。清光绪时，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农民在掘地时，意外地发现了甲骨，到1899年才引起金石学者的注意，一直研究至今。甲骨上的文字，就是使用锐利的质地坚硬的工具刻划所致。英国教士明义士，在殷墟中得古玉像箸形，上钝下尖，长约4至5寸，故名为“殷笔”。这可能就是当时在甲骨上刻划文字的工具。再者，古人已创象形文字“聿”字，上端“臼”形，酷像一只手握笔的样子；下端“丂”形似上钝下锐的刻划工具，和“殷笔”没有区别，观其整个字，犹如一只手握笔刻划文字的样子，形象逼真。由此可见，殷商时人已创制并使用硬质锐利的工具，刻划记录文字。因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是供当时祭祀时占卜记事所用，故称为“甲

“骨卜辞”或“甲骨文”等。其字的笔划大都平直，两头稍尖，瘦挺纤细，结构安排疏密有致，匀称严整。在今天可识的汉字中，以甲骨文最为古老，可以说是我国起源甚早的一种书法形体，堪称为硬笔书法的鼻祖。清代刘鹗《铁云藏龟》自序里称甲骨文是“殷代人的刀笔文字”，至今仍被书学者临摹效仿，被人视为创作的书法作品的一种形体。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的金文，也是用硬笔——刻刀等物刻或铸在钟鼎一类的青铜器上的。

到了封建社会，盛行刻碑石、刻书帖之风，硬笔更是大显身手。但已经退到服务于软笔书法的地位。刻碑石，就是书写者用软笔蘸朱墨直接写在石上，然后用刻刀照原作进行镌刻，但不乏有循刀法之便，稍有出入之处。直接奏刀镌刻只有极少的人了。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秦时的石鼓文及记事石刻《泰山刻石》等；东汉的碑碣刻文；魏晋碑刻及墓志石刻；南北朝的造像石刻；隋唐的丰碑巨碣石刻、造像、墓志等，都是经刀刻而成流芳百世的。刻帖经摹勒上石后，刻工使刀笔依字镌刻，但都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不允许有丝毫走样或任意奏刀的自由。刻帖之风盛行于宋、元、明、清朝，清刘雨若刻《快雪堂帖》而名噪当代，号称“铁笔名手”。时至今日的篆刻艺术等，无一不和硬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都在摸索用什么材料制作书写工具为好。有人发现植物桔杆纤维也可制出好笔，元吾邱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中说：“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这种竹挺笔大概就是一种稍作修整而较简易的一种书写工具。比起晋时的竹丝笔来要逊色的多。据说，竹